

目

录

回忆遂师学潮.....	1	郑 萍
“打师管区事件”的始末.....	6	吴玉超
华发回首话《晨星》.....	8	姚翔翔
李树骅传略.....	10	
		雷守谦 周 立
遂宁反动党团概况.....	13	黄德寿
有名无实的遂宁农业推广所.....	16	胡光翰
从遂宁县商会到遂宁工商联合会.....	18	李国梁
遂宁私塾见闻.....	22	刘伯常
有趣的打油诗和对联.....	25	尔 玉
从黑暗走向光明（续三）.....	28	赵洪轩

回忆遂师学潮

郑 萍

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国民党统治地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他们滥发“法币”，致使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难之中。遂师校长任熙烈（又名任梓勳，南充人），一方面为了压制同学对当时政局的不满，又为了利用“节省”的口号以便从牙齿缝里挤出的学生伙食费上报省府要功（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又要留下一部份以饱私囊，因此同学们的伙食开支大幅度下降，甚至每天每顿食米数字都要经任批准，稀饭稀得象粥糟开水一样，一周内很难吃上两顿干饭。当时读师校的学生多数来自贫寒家庭，满以为读公费学校可以吃饱点，殊不知事与愿违。随着日子的增加，煎熬更加难受了。这年六月三日，各班推出伙食监督同学代表共八人，齐到办公室向任校长要求每顿增加一点大米下锅，任氏当即感到问题严重，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增加一点，以缓和矛盾。本来事前同学中就已酝酿如最低要求都达不到，就要闹学潮，就要轰走任熙烈以及早已为同学不满的军事主任教官赵简如等。当学生代表离开办公室不久，训育主任青良翰从桂花镇街上（他家住地）来，听到了任熙烈答应学生的要求，勃然大怒，认为学生是要挟，绝不能容忍，竟以训育主任的身份把同学的要求全盘否定，以维护其“尊严”，并对任熙烈说，“那几年我在×县师范学校当主任，学生闹事把传单闹到办公室里来了我都不怕，这点怕什么？……”任氏经他一吹，也反口不承认增加食米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同学就暗地商量决定起来闹，一直要闹到把任熙烈撤职，不达目的誓不终止。

一九四二年六月五日，遂师在校各班班（级）长秘密研究决定，当天晚上下自习时以由领唱抗日歌曲的同学吹哨子标音为号，全体同学立即吹灭教室内桌上的菜油灯鼓噪而动，规定在自习时间每个同学赶写一些与闹学潮撵走任熙烈及其同伙的标语。此时教务主任朱一立、训育主

任青良翰、总务主任蔡定煜、军事主任赵荫如等人似有察觉，当即穿梭巡视各教室监视动静，某班一同学在写标语时被老奸巨滑的蔡定煜发觉，与蔡当即抓扯起来，教室内的同学见此情况乃不得不告之负责同学，认为形势紧迫，乃通知标音同学，提前发出信号灭灯，当口笛一响歌声将起，群众一片怒吼声响彻云霄，与敲击桌椅板壁声连成一片，声势浩大的“学运”在遂师爆发了，吓得青良翰、赵荫如等人当即逃窜下山。同学们乘胜挺进，分别直奔办公室女生院找任熙烈及女教师马培英等人，意欲质询并当面将他们那一群赶下台。但此时任熙烈却未在办公室里，深居山下禹王宫旧址寝室内。当他听到山上同学吼声，便连夜与其女及未来女婿朱一玄等人仓惶进城向当时的四川第十二区行政专员公署告急，谎报有异党（意即指共产党）暴动。过后夜渐深了，各班班长（级长），伙食监事和少数热心学运的同学齐聚在一教室内商量善后事宜。经研究决定：（一）成立遂师学生自治委员会（即学潮委员会），推选七班级长何世森同志为主席，九班杨健同学为副主席。自治委员会下设顾问团、秘书处、交际宣传股、保卫股等，分别处理学校内部团结一致及对外宣传学潮的目的（旨在撤换任熙烈校长职务及赵荫如、朱一立、马培英、樊民题等人的现任职务），以及筹划学运如何推行，秘书处负责草拟宣言及有关动笔的一切事情。顾问团则是学运的决策机构。所有人员都应做到绝对保密。其中罗闵（甲江县人）、李维成（武胜人），都是九班同学，为核心领导成员。我被分到交际宣传股任股长，主要任务是对来访人士阐明学潮真象及回答质疑，以此揭穿任氏一伙歪曲事实，欺哄社会，迫害同学的险恶用心，争取各界对学潮同情、支持。管兴亭同学在秘书处担任拟稿及善写有关材料工作。（二）写《告社会人士书》说明学潮起因经过目的，以争取社会舆论支持，拟《告省府电文》说明学潮真象及正当要求。（三）安定学校秩序，规定要求全校同学明白大局，要按学校一贯制定的作息时间表进行作息。照课表排列的课程在教室里

进行活动（即自习）。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反动派钻空子，安上破坏捣乱的罪名，使学潮能照预定步骤进行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上述几点内容，即告全校同学。半夜了，除决战的同学和保卫全校安全的同学外，其余同学才陆续就寝。但大多数同学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宁静，低声细语，议论纷纷，考虑对策，通夜不止。

学潮的第二天，被选派的十几位同学黎明即步行进城，首先电告当时的省府，说明学潮情况及要求，并设法找印刷单位印制学潮传单，同时向社会宣传。就在这天，桂花镇乡公所一批公事人员，又在校例行劝解，观察动静。由于同学们的要求正当而坚决，使其不得不应付一下，以尽地方官吏“应尽之责”而去。不几天，省驻区督学吴巽生，来校向同学宣讲，此人善诡辩，他要求先复课在谈对任校长的处理。与同学们的要求很明显的对立，致使同学不服，当场反对。吴氏十分尴尬，只得扫兴而去。接着遂宁县长郭平，专员公署教育科长刘少培也来校，企图用压力阻止学潮，其阴谋未逞。遂宁城内县三青团干事长贺白光及组织股长王缉光，亦到桂花师校来告诫师校的三青团员离开学潮圈子，以图分化瓦解学潮力量。但由于革命潮流的影响，同学中的三青团员多数对他不予理睬，贺白光之流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为了使学潮有始有终地取得胜利，大家团结一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了避免发生历史上已有的革命被贩卖同志受迫害的恶果，学潮领导集体规定每个同学必须亲笔写一张明白表态自愿闹学潮的签名盖章的条子，交学潮领导成员负责保管，全校当时在校同学每个人都自动写了这样的条子，由此充分表示了学生们闹学潮的坚定决心和团结一致的意思。

同学们的要求与当时遂宁专署的决定始终发生着根本的矛盾而使问题不能解决。专员程厚之在任熙烈的恳求和催促下，终于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于旧历端午节前夕，下令派遂宁保安队、警察所及专署侦缉

队军警、特务约四百人，半夜从城内出发，荷枪实弹，赶赴遂师。凌晨将师校团团围困，警卫森严。黎明约六点钟时，蔡定煜当即把我三十一个同学同时逮捕了，先拘押在桂花镇乡公所对面五显庙内。当时许多同学高呼，要求释放我们，但也无力为之。女生院的同学从这天早晨起，就被武装军警封锁院门，不准随便走动，更不许外出。一些女同学企图几次突围都未成功，有时还被军警用步枪枪托及通条打得伤痕遍体，山上都能听到惨叫声。我们被捕的三十余人，除姓罗的女同学另被看守外，男同学全被关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中。第二天我们从牢房的木槛缝隙中，看见同情我们闹学潮的赵泽南老师也被捕了，不几天他虽被保释，但被解聘，离开遂师了。

我们被捕的三十一个同学，后被押到遂警察局内，由专署审讯我们时，主审人是专员程厚之，还有专署教育科科长刘少培，遂宁县长郭平陪审。公案两旁站了几名持枪的武装刑警助威。我们同学是被隔离一个一个的进行审讯的。程厚之对我提问很多，本来我都一一回答上了的，但他们毫不讲理讲法，仍决定把我和杨健、管兴亭、黄晋诚、黄安量、邓鸿烈、唐坤照及李百能等八人押到重庆兴隆场五云山集中营囚禁，刑期不定。其他二十三个同学取保候审，由学校分别给予开除、停学、写悔过书等处分。在押往重庆前我与杨健被关在大监（即猫猫口）里，里面一些老“犯人”都说：“这里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抓不出去啊！”我同杨健与几个老“犯人”（都称窗友）住在一间只五、六平方米的小监内，解大便、小便的尿桶都还在里面，又是热天，真是臭得要命，睡处是旧床，烂蔑席下面臭虫就象蚂蚁一样多，那能入睡啊！初偿铁窗风味，使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倍增，对争取解放更加强烈，要求革命的信心更坚定了。我们被捕三十一人中，有一个同学是八班的，名叫王朝生，因坐牢被病出狱，回到盐亭去，不久便死了。心黑手毒的程厚之曾

下令：将何世森抓住就地正法（即枪毙），幸何化装脱离了虎口。

城内坐牢一月多后，把我们押到重庆磁器口。先押在一家卖“平民饭”的旅馆的小屋里挤了一夜。第二天强迫步行到兴隆场吃午饭，我们设法在巡官处看到了押送我们到集中营（表面上叫“战时青年训导团”）的公文内容。都被增加了罪名，都是什么“学潮核心分子”、“学潮骨干”等，我的名字下面还另加了一条：“思想复杂”。

我们在重庆兴隆场五云山集中营被关押了一年多，因都是学生的身份，敌人认为我们是青年无知，问题不大，才于一九四三年八月把我们八人分四批（每天走两个）放出监狱。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把遂师“六、五”学潮镇压下去了，但遂师这场反独裁、争民主，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对旧中国、旧秩序、旧制度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它对后来学生革命运动的发展是起着有力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上结第12页）

一九六六年七月，不幸在成都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公职，对其亲属进行慰问和抚恤。

（本资料在搜集过程中，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敬请知情人士斧正）

“打师管区事件”始末

吴玉超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正值遂宁逢场。川中师管区基于团团部（驻小西街南华宫，现遂宁市医院职工宿舍）。因本县南强乡第六保壮丁李光扬之母李龙氏前往探亲，被七连守卫班长肖书贵枪杀致死。引起群众公愤，于五月二十二日午后，包围了基于团团部。（摘自遂宁县府纪录，全宗号4，目录号4，1——3页）。县长郭平于二十二日下午八时在天主堂（~~天主堂~~）召开了“党政军各首长临时紧急会议”，出席人员有：王玉章、向凤武、陈子衡、马福祥、郭平、方乐喜、李竞芳、彭乐、邓明光、杨斌。郭平说：本日午后四时，市民包围师区基于团发生冲突，捣毁营舍，枪伤市民，迭经劝导，屡散屡聚。截至现时，天上街一带尚未平静。特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治安办法。（摘自遂宁县档案馆，全宗号4，案卷号3，150页）。

官逼民反，事出有因。国民党政府口喊“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实际上贪官污吏、官僚资本和土豪劣绅，互相勾结，不但一不出钱、二不出人，反而大发国难财。他们囤集居奇、麦抬物价，强征苛捐杂税，估拉贫民当兵。■司管区捆绑壮丁，克扣军粮，拖死、打死壮丁之罪行，早已怨声载道。南强六保农民李光扬，系家中唯一劳力，被强拉当兵，关进司管区里。其妻段氏偕母龙氏于二十一日去司管区大门，送去鸡蛋，要求见李，殊被■兵阻拦，婆媳俩苦苦哀求，都不得见面，围观者众，不平者多。基于团第七连守卫班长肖书贵气势汹汹，持枪威胁说：“再闹就开枪”，话未说完，就乒的一枪打死了挤在前面的李龙氏。于是群情激愤，一齐向内涌去，门岗也挡不住被激怒了的人流，只好龟缩不出。

路见不平，人声鼎沸，无不愤怒谴责师管区开枪打死壮丁家属。翌日，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包围了团部，高喊交出凶手，全城要道堵塞，群众义愤填膺，商店纷纷关门，停业罢市。郭平才急忙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司管区杨斌、向凤武为一方，主张向省政府谎报“遂宁民变”，以便镇压群众，为自己开脱罪责；新九师混成旅旅长李竞芳、县长郭平和县党部、县参议会为一方，害怕谎报民变、难逃“治民无方”的责任，因而坚持将位兵开枪打死壮丁家属据实上报。双方争持不下，杨斌凶相毕露，大骂郭平，并给郭平一耳光。李竞芳忙令士兵朱发云、黄朝云、李相如、向荣等人将郭护住，并劝走杨斌、向凤武等人。紧急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遂宁县府向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新九师向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县参议会向省参议会议长李伯申、县党部向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地方势力（县商会、袍哥组织）向在成都的李树华等报告实际情况。恰逢蒋介石来成都视察，驻在中央军校。张群、邓锡侯谒见时，趁便向蒋报告了遂宁事件经过。蒋介石听后，为了欺骗社会舆论，叫侍从室急电将杨斌调离遂宁，“立即赴渝，听候处置”，并由省政府发电，嘉勉郭平，另有任用，由彭心明继任县长，将守卫班长肖书贵执行枪决。风波始平。

不久，以部队整编为名，将李竞芳调离遂宁。而杨斌“候处”亦未闻处，郭平另有“任用”亦未闻用。彭接任县长时，郭只好在大西街租房暂住，办完移交后迁回故里。足见蒋介石为民申冤是假，庇护蒋军将领罪行是真。在事件中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地方官员反而成了赔葬品。郭平离遂时，有部分民众自动鸣放鞭炮送行。

华发回首话《晨星》

姚翰翔

我所回忆的是当年遂宁学生界的一件大事。当年一起并肩战斗的年轻伙伴，而今都已满头华发。旧事重提，目的是为了激励当代青年，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肩负起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寇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眼巴巴地盼望着能有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来临，可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却准备一巴掌再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入血泊之中。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对独夫民贼蒋介石进行曲折激烈的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召开旧政协，假惺惺地表示愿意“还政于民”。可是旧政协决议的墨迹未乾，蒋介石却派出特务分子刘野樵之徒，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在重庆较场口大打出手，演了一出殴打爱国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的丑剧。正如民盟总部发言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说：“蒋介石此举，实无异于对全国人民当心一枪！”当时我对此满怀悲愤。

这时，我正在遂宁高中读书。我是遂宁河沙乡人，与河沙乡小学教师肖远明（王子度同志的家庭教师）很友好，深受其思想影响而倾向革命。当时我在遂宁高中组织海啸壁报社，创办《海啸》壁报。一九四六年上学期，民盟成员阳西垣老师来作我们的语文教师，他积极支持我们联合几所中学的同学组织一个进步文艺团体。一九四七年，我们联合了遂师、遂校、遂中三所学校的进步学生，组织起一个进步文艺团体《晨星文艺社》，参加的人以遂师的进步同学最多，有雷金声、蒋含光、黄绍群、潘星海（原名潘鸿志，烈士，殉难于重庆渣滓洞）、刘士梯、柯子余、李武纲；遂宁农校有王旭；遂宁高中就只有我一人。通过盟员李

武纬在遂宁《涪声日报》作编辑的关系，每逢星期日在《涪声日报》副刊刊出《晨星文艺专页》。我们当时曾组织进步文艺作家沙欧·绿蕾的稿件。我们每个社员都动手写稿，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政权。至今清楚记得，我以羊羽、夏阳等笔名，写过一篇小说《被“优待”的老张》，写一个抗日的壮丁在前线牺牲，而家属应领的“血饷”（抚恤）则被■乡长侵吞，军属张老头去找■乡长说理，反被■乡长打死，因而激起民愤捣毁乡公所，又写了一篇抒情散文《夜奔》，描写林冲投奔梁山的心情，黄绍群和蒋含光同志以任众、金戈的笔名，写过《关于新现实主义》的论文（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只好将“社会主义”隐去，而代之以“新”字），潘鸿志以“一丁”的笔名，写过小诗《默哀》（内容是哀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王旭同志以“姚位”的笔名写过讽刺诗《遂州公园即景》，讽刺国民党的遂宁专署县府就是一个“大的扯谎坝摊摊”。因此晨星文艺一共只出了五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据传说：国民党遂宁县党部头目雷惊曾歇斯底里地咆哮：“这些文章简直和《新华日报》上登的那些东西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下令追查。结果编辑李武纬（现在南京太平天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同志被解职，转入地下。

反动的遂师校长王永言（国民党G. G、特务，已镇压），竟以“不守校规”和“学习成绩两科不及格”等捏造谎言为借口，将雷金声蒋含光等“斥退”（即勒令退学）；遂宁高中亦准备“斥退”我，因杨兴中老师（当时的教导主任）感谢我的父亲为他治好疝气，因此对我加以庇护，我才侥幸在遂高毕业，旋即离开遂宁，在川北民盟组织的率领下继续为民主革命而做份内应做之事。

李树骅传略

雷守谦 周立收集整理

李树骅(1893——1966)四川省遂宁县吉祥乡人。青年时在嘉定旅省中学读书。后考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四川陆军小学)毕业后,赴上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从事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四川,又在中华革命军川西总司令部任参谋长。后到护国军(蔡锷部队)第一军司令部任参谋长。

一九二一年在四川陆军第十师任参谋长(刘昂九部)该师交何光烈后,任全川烟酒总局局长,署盐源、建为、马边、德阳等县知事,遂宁县立初级中学校长。

一九二八年李家钰委任李树骅(李树骅与李家钰系军官学校同学)为遂、安、潼、乐、遂五县联防委员长和四川边防军卫戍区团务督察长,兼农村警卫司令、兼四川边防军少将特科司令(司令部驻遂宁小西街即现在的税务所内)。在此期间,经中共四川军委书记李鸣阿通过边防军司令部上校参谋贾良俊(共产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九年根据中共四川省军委指示,联防军(李树骅部梁恩如连)配合驻在距吉祥寺二十华里永兴场的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扩继勋部,同时发动起义,占领遂宁。因扩军为军阀逼迫甚紧,起义很快,李(树骅)部准备不及,未能及时配合行动,使扩军不得不改变计划,北走蓬溪。扩军起义失败,李部自感孤立,当时驻遂宁的国民革命军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消灭民团中的共产党,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迫李树骅与共产党斩断关系,要他亲自带领自己的队伍与边防军一起,向当时准备在吉祥寺暴动的民团实行进攻。二李(李树骅和李家钰)相互合谋策划,暗设埋伏,将红军之友的领导同志吴尔笃乱枪打死。虽然红军之友游德明等同志进行了英勇反击,击伤了李树骅的左耳,但

因寡不敌众，牺牲了十一位同志，赵子文、李截浦、程俊夫等同志在开会时被围，对来围的边防军说，都是李树骅司令部的人，当时李树骅亦点头认可，才由李树骅掩护送出重围。由于李树骅使党遭受损失严重，党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一九三一年李树骅将遂宁县民团编组成军，去投靠邓锡侯，邓则委他为二十八军第十七混成旅旅长，部队由遂宁移驻新繁县。

一九三二年秋，各地反共事件，频频发生，如成都警备局对协进中学进行大搜捕，该校教务主任何时光（共产党员）从外回到校，见校门被军警把守，乃到李树骅家（在燕鲁公所街协进中学对门）找李树骅掩护，李当即答应，让何藏在冢中，使何免遭特务迫害。

一九三五年（即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实行川政统一，同时将川军也整编为正规部队。李树骅部受编后，改为陆军第九十五军第一二六师（师长谢德堪）三七八旅任少将旅长。同年五月该旅奉邓锡侯命令立即开赴昭化、广元、旺苍一带地区阻击红军北上，尔后又转移到天全、芦山一带布防阻止红军入川（未发生战斗）。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树骅部奉令调成都郊区，遂升任为一二六师副师长，仍兼三七八旅旅长，不久又升任为中将副师长，兼成都疏散区警备司令，再兼成都防空司令。抗日战斗胜利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以李树骅之女李隆蔚是共产党员为由，撤销其一切职务。李树骅返回遂宁当袍哥总舵把子，经常来往于成都、遂宁之间，后定居遂宁。

一九四四年李树骅之女李隆蔚（系抗大，延安鲁迅艺校毕业，曾任新华社记者，现已离休）。经周恩来同志批准，由延安返川作争取李树骅做川军策反工作，临行前夜，周恩来同志向李隆蔚说：“你父亲虽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他在政治上还是反蒋派，私人财产不多，当了中将没有私人汽车，所以可以争取他作些川军工作”。

一九四五年春节期间，李隆蔚经中共重庆办事处江震同志，派周

副主席（周恩来）的副官杨继于同志送回遂宁吉祥寺后，李隆蔚托其兄李隆义去成都转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党的统战政策等。并对李树骅晓以大义，使其作川军策反工作，同年三月李树骅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和邓锡侯、谢德堪共同商量后，派其侄李隆仁返回吉祥寺，嘱李隆蔚化装到重庆，找周恩来同志联系，当时适逢周恩来同志返延安，李隆蔚乃向王若飞同志汇报川军一切情况（武力、人力）”根据王若飞同志指示：“候时机成熟，党派民盟张澜（张袁方）先生与川军联系”。

一九四七年李树骅在遂宁被选为国大代表后，于同年在南京开会期间，加入了国大代表联谊会（即民革），回川后，李树骅经常在成都公馆内与中共地下党及进步人士联系，进行反蒋活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中共地下党川北工委书记华健同志的爱人徐邦嘉遭敌特追捕时经李俊烈同志介绍，搭乘李树骅的小汽车转移到成都。（中共地下党员）

一九四九年李树骅从中介绍王叙五同志和王涵同志到谢德堪部做兵运工作，并掩护成都、遂宁两地的地下党员王子度等同志。当时的雷从周、周必传等同志，为了与党联系工作，也在李树骅家里。同年李树骅支援银元、黄金给王子度同志作地下党活动经费（数目不详）。据李俊烈、雷云谈支援不只一次。又据王涵谈（王被国民党通缉后逃往中江等地打游击）并以武器给地下党游击队。

一九四九年李树骅经女儿李隆蔚的动员去作川军策反工作同年冬他和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一起起义迎接解放大西南，成都解放后，李树骅系川北民革负责人，经党的安排，在川北行署任川北区剿匪副总指挥（清匪反霸），又任川北政协驻会委员。

一九五八年李树骅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下转第5页）

遂宁反动党团概况

黄德寿

解放前遂宁从李家钰统治时期到解放，有关党（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团（三青团）的情况，由于时代的演变，事隔数十年，难于全记。经我回忆，兹将概况分述如下：

（一）国民党：早在边防军李家钰驻遂期间开始组建。李家钰部原是川军二十八军邓锡侯的部队，占有八县地域。蒋军入川后，该部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四川边防军”，李家钰任总司令，总部设在遂宁三元宫（北辰街）。因为国民革命军是南京国民党领导的，所以总部设有政治部，在当时县政府左侧新修一幢一楼一底的楼房（即今人民政府进门的一幢），主要是以三民主义武装部队的思想，以加强国民党对该部的控制。为了培训军队及地方党务人员，该政治部举办了一个短期“党务训练班”。遂宁地方上参加受训的有，李建国、雷惊、毛羽丰三人。结业以后，回到地方成立“中国国民党遂宁县执行委员会”。由于他们三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加之在地方上没有声望，所以当时的国民党，在遂宁的一般人看来是有名无实的招牌而已。后来，（大概是1933年）雷惊、毛羽丰又被调到成都四川省党部举办的“四川省党务训练班”受训结业后，回县担任筹组“中国国民党遂宁县委员会”。因毛羽丰的文化程度比雷惊高，所以书记职务就是毛羽丰担任。雷惊、李建国、陈最清只任了执行委员。在筹备工作期间毛羽丰与雷、李等意见不合，决定把县党部设在天上街龙王庙办公。他们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兼之毛羽丰在社会上没有声望，得不到地方上层人士的重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只好找了几个与他有交情的刚出学校的小学生张昌元、毛凤洲（他的胞弟）给他办理日常工作，雷、李等人表面上

手旁观。暗地里在上层四处活动,以得到上层的支持。毛羽丰没有搞多长时间,国民党县党部就被雷 惊、李建国等人掌握。县党部又改设在遂州公园仙井观,并安插一些有声望的陈最清、甘君瀛等人在会内。下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配干事数人经办日常工作,国民党遂宁县党部从此组织完备,由■县府拨给活动经费。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冬,在全县教育界中,普遍吸收中、小学教师入党,我也是那次入党的,地点在高升街小学礼堂,集体填写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指定写雷 惊、陈最清、专署科长张德府、张锦兰、任恭安等,以后分两批发下党证,第一批先发是“川”字;第二批晚点时间发下是“蜀”字,我的党证是蜀字4940号。一九三六年省党部派刘大治任书记长,雷 惊等人任执行委员。随着人民革命的不断发展,国民党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县党部的权力逐步扩大,又在教育、行政部门发展党员直到基层保甲人员都被吸收入党,各乡镇设区分部,设书记一人委员若干人分管组织、宣传工作。尽管他们大张声势发展党员,但是当时不少入党的还不知道入党后该做些什么,开始多认为能升官发财,事实上入了国民党没有政治靠山和重金行贿的人,入党跟不入党的毫无区别。因此,国民党不但组织涣散,而且名声很臭,因为苛捐杂税太多,一般人都喊“刮民党”。刘大治调离遂宁以后,有刘洁继任,最后就是雷 惊继任至解放。

(二)三青团,遂宁三青团的创始人是贺白光,遂宁白马人,四川大学毕业。回县后在遂宁初级中学任教师,在县党部的领导下,筹组三青团。最初在学校发展青年中的小学教师,接着在中学发展青年学生,其组织系统以各中等学校为单位设区分队。一九四七年他竞选国大代表,就以三青团为基本力量。当时为了加强他竞选的势力,就派出得力人员分赴各乡保甲以及社会袍哥组织,采取“封官许愿”手段,发展三青团员,扩大三青团组织。竞选失败后,于一九四九年

任川中师管区政工处长，离职后由于事王辑光升任遂宁县三青团干事长，直到解放。

(三)青年党，遂宁青年党负责人是曾湘泉，他出身是商人，住半边街，在成都经营有铜铁铺，他在成都参加青年党后，奉命回县组织“遂宁青年党。”由于他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势力没有多大的联系，影响较微，发展人数比国民党和三青团都少得多。

(四)民社党：一九四四年遂宁田管处调来一位处长叫周德修，是民社党员。接任后就成立“遂宁民社党”，地点在天上街遂宁田管处，他因职务关系发展党员，主要是田粮系统所属的乡征收处的职员。

以上概况系我的回忆，当中差误难免，撰写出来，以供参考。

(上接17页)

时的“冷门”职工便成为刀下之肉，坐未暖席的新增五名指导员（都经省府委任）都光溜溜的完全裁掉。为装饰门面，只留一个主任和一个事务员，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县长陈伯良索性调我回西宁兼任乡长职务，只留杨焕奎一人守着招牌。所幸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遂宁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获得了解放，乾坤再造，万象回春。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遂宁县人民政府成立，我同留所的杨焕奎造具清册向人民政府办理移交。有名无实的原遂宁县农业推广所宣告结束。

有名无实的遂宁县农业推广所

胡光翰

解放前的遂宁县农业推广所，是县属的一个农业机构，隶属于遂宁●县府和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领导。它的职能，顾名思义，是将试验成功的优良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农具、农药、病虫害防治……以及农林牧副渔有关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实物向广大农村群众宣传介绍，推而广之，达到促进农业生产，繁荣国民经济的目的。说也可笑，我作了这个所一年多的主管人，连有关的组织规章，工作条例等文件都没有看到。上司也没有直接布置应做的工作，给以明确的任务，更没有参与有关的专业性任何会议。主管上级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在一九四八年王普澄接任所长时发来一个通知，其它什么也没有见到。

记得一九四八年夏，遂宁●县长冯英与达县县长陈伯良对调，遂宁县农业推广所主任杨权衡是冯的同乡亲信（西充人），冯走杨也随之去了。这个所的主任位置就留出一个空缺，虽是“冷门”，而觊觎追逐者却大有人在。是年春初，我由重庆回遂，应聘到遂宁精一中学校担任总务主任，本不想染指乡土之事，这时●参议会住会参议员何丹根（西宁同乡）来找我，他说：“你是学农的，应该为农业作点贡献……”。我说学校工作丢不了。他说：“我是代表参议会来找你的，你不要高傲，我是为你设想，丢了碎痒狗咬人（一九四七年我逃卸西宁乡长去渝刚一年），应该在县上挣点声望才是”。我毅然未与争辩。何走后，我一人到这个所的住地——船山公园“仰止堂”（现竹林茶园处）看了一下，平房三间，空空荡荡，除两张桌子和一架生锈多年的犁头倚壁放着外，其它一无所有。一个姓陈的事务员守着招牌，一雷一杨两个指导员都是城里商店的职工，很少来所兼理指导员职务，我看后立即向何丹根回复，这个差事我任不了。他问何故，我如要以